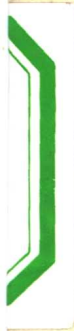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增刊

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部編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增刊

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部編

(供內部參考)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

书号 168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3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5}{8}$ 插页 2

1963年8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1.05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編輯說明

为了了解和研究苏联近年来的文艺思想，我們編了这套內部資料。內容包括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党性、真实性、时代性、写战争、正面人物、传统与革新、自我表现等問題，以及有关苏联青年作家的材料。文章是从1959年以后的苏联报刊、書籍中选譯的，大部分是全譯，一部分是摘譯。先后次序是按時間排列的。

由于編者的水平关系，編选工作中一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希讀者指正。如果需要公开引用里面的材料，在注明材料来源时，务請用原著报刊書籍的名称，并請核对原文，以求正确无誤。

这一輯的內容是关于文学与人道主义。为了避免重复，凡是已經在刊物或內部資料上发表过的文章都沒有收入。現将其中較重要者开列如下，供讀者参閱：

謝尔宾納：党性与人道主义

阿尼西莫夫等：生活—理論—文学

奥泽罗夫：在为了人的斗争中

謝尔宾納：文学的道德感召力

沃尔欽科：馬克思列宁主义倫理學論良心

古里亚：我們是人道主义者

謝尔宾納：人和人类

《文学問題》編輯部：人道主义和現代文学

(以上載《人道主义、人性論研究資料》第1輯，商务印書館，1963年)

洛米泽：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团结

潘柯夫：人道主义在进军

柯彼列夫：关于没有形容词的人道主义和不带引号的博爱

迪姆希茨：唯一的康庄大道

（以上第一、二篇载《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1期，
第三、四篇载第2期）

1963年7月

目 录

从茲洛宾的文章談起(节譯)	捷明季耶夫 (1)
现实的人道主义(节譯)	苏奇科夫 (40)
人民的和人的(节譯)	潘柯夫 (68)
論思想性与人性(摘譯)	艾里斯別格 (90)
人性、人民性、技巧(节譯)	雅基緬科 (106)
真正人道主义的文学	伏倫斯基 (120)
个人、道德、文学(节譯)	尼古拉耶夫 (131)
“我是人,我是共产党人!”	勃罗夫曼 (145)
真实的力量(节譯)	納波洛娃 (159)
“我是人,我是共产党人!”	諾維欽科 (172)
人道主义的敏銳性	苏罗夫采夫 (202)
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	謝尔宾納 (218)
善战胜一切	艾特瑪托夫 (228)
文学和个人的精神发展	謝尔宾納 (236)
当代人物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蓋 伊 (253) 皮斯庫諾夫
“現代人”	謝尔宾納 (301)
苏共二十二大決議中的美学問題(节譯)	济斯 (321)
时代的爭論(节譯)	蒲森 (328)

从茲洛宾的文章談起

〔苏联〕A.捷明季耶夫

二

在苏联文学中美就是为人民的幸福作斗争，它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就是共产主义——最完善和最正义的社会。苏联作家的作品充满了对劳动者的爱和尊敬，对剥削者、战争挑拨者以及所有妨碍人民过和平、幸福、创造性的生活的人和妨碍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人的恨。苏联文学作为人民的文学、党的文学、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崇高理想的文学，同自由主义的、抽象的伪人道主义是对立的（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作家同“山隘”派的“新人道主义”的斗争），同仇视人类、不相信人、冷酷无情、形式主义等的宣传是对立的。

例如，在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得何等明显而充分！这里有无情憎恨敌人的、残酷的却是正确的教导（《难道他们怜悯过我们吗？》），有对纳古尔诺夫的“过火行为”的责备，有关于内丁诺夫所做的教育解释工作的出色的（从人道精神上说）描写，有十分惊人的（从人道主义力量上说）农庄大会的场面，在大会上达维多夫对把他打得半死的那些“没有觉悟的女公民”进行解释。

我们的文学同我们的社会是血肉相连的。苏联文学的人道

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的反映。正是在我们国家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里，人道主义才获得了现实的实践基础。这里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 and 工具的私人所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没有失业，没有贫困，没有政治上的无权现象，没有民族的不平等，没有对妇女的欺凌。

今天，外国敌人的宣传企图利用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最可耻的投机手段。资产阶级刊物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每天都在诋蔑我们的制度无人性、暴虐，并高喊“拯救人道主义”。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诽谤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这一运动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诋毁我们的国家，粉饰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者叫嚷得最厉害的是关于同个人迷信有关的破坏法制和无辜镇压的问题。但是，以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为口实来反对我们社会制度基础的企图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坚决地纠正了过去的公正和违法行为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些现象是同苏联社会的本质相矛盾的。人民的福利，人的幸福，全体苏联人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满足他们精神上物质上的要求，这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的主要目的。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历史性的决议标志着我国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号召苏联人巩固苏维埃国家和保持警惕性，争取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平，要求以殷切关怀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苏联人，关心他们的需求，关心他们的尊严和自由，要求相信人，信赖他们。人道精神乃是苏联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表征。

“……剥削阶级的道德特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道——是这样的残酷的公式：‘人对人是狼’。社

会主义确立了另一种道德——合作和集体主义，友誼和互助的道德。这里把关心人民的共同福利，把关心集体条件下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提到首位，在这个集体里，人对人不是仇敌，而是朋友和兄弟。”

世界上最人道的哲学和道德是苏联文学的基础。在我們的时代，苏联文学的任务是积极地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性恪，因此它要更高地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建設共产主义是为了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苏联文学以自己的深刻的人性和对人的力量的信任博得了最普遍的贊揚。

这就是苏联文学人道主义性質的最一般的特点。但是，常有这样的事：問題不只是在于对某些一般原則和要求的正确理解，而且也在于对这些原則和要求的实际的和具体的运用。在这里有时就流露了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片面的，簡單化的認識，并明显地表現出不善于运用这些原則。茲洛宾的問題就是这样发生的。^①

他在《严酷的战场》里发现了伪人道主义和对問題缺乏党性的提法，发现了素食主义式的寬容和（几乎是）替符拉索夫分子^②及符拉索夫主义者的辯解。但是，正如上面所說的，为了这一切他只好对卡里宁的小說进行任意的解释，避开作品的真正内容和趋向，并毫无根据地怀疑和指摘安德烈·索什尼可夫。

关于《严酷的战场》，在我們的报刊杂志已經写得很多了。一般的意見都認為这个作品充滿了对苏联人、对集体农庄制度和对我們整个生活的热爱。作者以真正的詩意和深刻的同情描

① 指茲洛宾的文章《談卡里宁的小說〈严酷的战场〉》，与本文发表在同一期的《新世界》杂志上。——譯者注。

② 法西斯一个組織的番号。——譯者注。

写了頓河的集体农民达莎·菲尼雅，柳巴娃，年青小伙子安德烈·索什尼可夫(儿子)和他的未婚妻卡佳·伊凡諾娃，区委書記叶列明和农艺师柯尔卓夫。卡里宁又以不可調和的憎恨描写了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描写了妨碍共产主义建設的人和守旧的人。例如斯杰方·捷明，这个私有者和貪婪者，小偷和侵吞农庄财产的人，对一切新的苏維埃的东西都抱深刻敌意。因此，在卡里宁的小說里同情和反感的界綫，爱和憎的界綫，美与丑的色泽都得到鮮明的、令人信服的表现。有党性也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过去的战争图景在小說《严酷的战场》里占着重要的地位。也許，这里有“对問題的提法缺乏明确的党性”？有和平主义的傾向？完全沒有。卡里宁的小說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小說。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在小說里是作为一种“神圣的，正义的”战斗表现出来的。

小說也描写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作家的立場不論在思想上还是道德上都仍然是明确的、具体的；对反革命叛乱者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不調和的态度，对匈牙利人民的兄弟般的同情，对忠实地执行国际主义义务的苏軍的爱。

我們同茲洛宾的爭論只是在对待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的問題上。关于这个人物的主要問題上面已經說过了。安德烈的真实形象，他的悲剧命运自然会引起讀者的热烈同情，并在他們的心灵中喚起苏維埃的爱国主义和人道精神的崇高感情。这也就是作家的目的。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的遭遇教訓我們：必須关切地、敏感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和冷淡地对待遭受了不幸的苏联人，應該信任地分析他們的不同命运，應該在需要时帮助他們。簡直不明白，为什么茲洛宾看不到这些，不这样看待問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发现了伪人道主义，認為这是丧失警惕性、对叛变

的辯解、对忠实地同法西斯作战的战俘們的玷污等等。当談論一个至死忠于祖国的人的时候，同坦护叛变有什么关系呢？描写一个在被俘的艰苦条件下仍然决心反抗法西斯的人，怎么会玷污了忠实地同法西斯作过战的人們呢？要是这样，那末对战俘的任何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描写就都要侮辱那些沒有做过战俘的人了。

誠然，在战俘中間安德烈·索什尼可夫不是唯一的正面形象，他被俘后所选择的逃脫的道路是可怕的，反常的。在战俘集中营里有反法西斯的地下小組参加者，有策划暴动的人。許多被俘人員的逃脫都不像安德烈那样，其中有些人是有組織地逃掉的，有些人参加了馬基（法国反抗希特勒侵略的游击队），有些人則找到了自己的游击队，并从他們那里得到了武器（而不是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問題在于，安德烈的所作所为与其說是他的罪过，不如說是他倒霉。要知道，我們有不少被俘人員是单独逃跑的，或者是用尽千方百計逃脫的。只要跑掉就成，只要回到自己这边来就成。而茲洛宾力图使人相信不可能有这样的特殊情况，这是徒然的。不，在战争的严酷的环境里，在被俘的艰苦条件下，一个人的道路确实是多种多样的。

当然，曾經做过俘虏的一些同志对卡里宁（确切点，是对作家米哈伊洛夫）沒有选取那些积极地参加法西斯集中营地下斗争的人来作自己的小說主人公会感到遺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明显，那时候他就得写另一部具有別的目的和別的任务的作品了。然而，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茲洛宾对安德烈的不信任 and 敌意竟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肯定安德烈“在决定性的艰难时刻”里是不可靠的，并把他同自己的儿子——誠实的苏联軍

人——对立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呢？只是因为茲洛宾把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看成了符拉索夫分子嗎？但是，这只是說明茲洛宾的文章的性質，而不說明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的行为和灵魂的問題。卡里宁沒有必要像茲洛宾的指示那样去說明安德烈·索什尼可夫如何克服杀害同胞和卑污罪行的“无数悲慘的污点”。其所以沒有必要，就是因为在安德烈的心灵里既沒有杀害同胞、也沒有卑污的罪行和“无数悲慘的污点”。安德烈無論如何也不适合于扮演符拉索夫分子生活中的传奇剧的角色。而茲洛宾不管怎样硬要把这种角色强加在安德烈身上的做法是枉然的，得不到什么好处的。

对安德烈·索什尼可夫这一形象的錯誤理解以及对这一主人公的不公正态度也决定了茲洛宾文章里对作为艺术作品的这部《严酷的戰場》不能正确認識。茲洛宾对卡里宁的小說的評語是：恶劣的、主观主义的、印象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方法，对創作工作的不严肃态度，模糊的、混乱的形式，沒有文学才气，精神分裂或半神秘主义文学的混血儿等等。显然，在这里，也像在“审判”安德烈·索什尼可夫时一样，他不願意表示任何的好意。但是，不幸得很，茲洛宾的种种“可怕的”詞句却是毫无內容的，因为他对安德烈的指摘是沒有根据的，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去作进一步的解释。由于茲洛宾对安德烈的控告落空，他对作为文学作品的《严酷的戰場》的批評也就完全破产了。

从后一种情况來說，批評茲洛宾的文章也就沒有多大意义了。

茲洛宾对卡里宁及其小說的主人公——作家米哈伊洛夫的責难是：他們沒有对与战俘生活和符拉索夫分子的罪行有关的具体历史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只是局限在苏林和叶列明的

叙述上。他說,这就是恶劣的主观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方法。由于这个緣故,茲洛宾在自己的文章里援引了一些他自認为是极重要的情报和事实。但是,第一,他这些材料大概不仅卡里宁是知道的,就是每一个苏联人也是知道的;第二,这些材料也不足以解决作者和作家米哈伊洛夫在《严酷的戰場》中所提出的任务。問題在于,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叙述战俘的生活或表現符拉索夫分子的罪行。在他們的艺术构思里沒有包括这些东西,而且在这里,这些东西也沒有必要。作品的目的和主题在别的方面:表現安德烈·索什尼可夫对祖国的忠誠,尽管有悲劇的遭遇,这种忠誠却貫串了他的全部生活。这里,苏林和叶列明的叙述,同达莎和安德烈的儿子的認識,同柳芭娃和杰明(他們对主人公是很了解的)这些人的認識都比那些尽人皆知的有关战俘的一切主要材料来得更有用处一些。难道在創作艺术作品时,可以局限在一般的知識上嗎?列宁在給馬尔曼德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小說里“……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別**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①。因此,茲洛宾非难卡里宁的小說反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是枉費心机的。这种非难是建立在十分不可靠的基础上的。

然而,是不是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的形象就已特殊到成了唯一的沒有任何典型内容的程度了呢?是不是他一般地已經不适于作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和不值得注意的人物了呢?是否必須去选择另一个更合适的人物呢?不过,要知道,离开作者总的构思和整个作品内容,是談不到主人公的选择問題的。为了表現一个人的复杂的命运,表現他的英勇精神和对祖国的爱,并在尖

① 《列宁論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卷,第711頁。

銳的形式中來處理人道主義問題，卡里寧同他的主人公米哈伊洛夫一樣，有權選擇安德烈·索什尼科夫這個形象。至於“個別”和“典型性”問題，如果只是把兩個概念完全對立起來，而不管作品的總的傾向的話，它們是得不到深刻解決的。的確，安德烈所選取的回到自己方面來的道路是不尋常的，特殊的，但是，這個個別情況卻使作家有可能非常鮮明地表現他所珍視的人道思想。這就意味着，這個個別情況是大可注意的，包含着普遍性的重要結論的。在其它方面，安德烈的遭遇甚至就普遍性意義上說都是充分典型的。對許多其它的文学作品主人公也都可以這樣說：在他們的遭遇中，個別的和一般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交織在一起的，而二者都具有廣泛的、重要的社會意義。葛利哥里·麥列霍夫是典型的，因為他的探求，動搖和折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廣大的非無產階級勞動階層在革命轉變時期和內戰時期的動搖。當麥列霍夫變成背叛者，走入死胡同的時候，對其整個社會階層來說他就失去了典型性。但是，他的命運——這個具體的人的命運——卻使人有可能得出一個廣泛而深刻的結論——關於任何一個脫離了人民的誠實的和聰明的人的悲劇命運的結論。

在敘述作家的工作和分析《嚴酷的戰場》里的藝術創作心理方面，茲洛賓的批評意見是較為有道理的。卡里寧在描繪作家米哈伊洛夫的工作和“創作痛苦”時，毫無疑問，有些地方是失去了分寸，添進了過分的感情，甚至是言過其實了。這特別表現在當米哈伊洛夫描寫安德烈·索什尼科夫（不知是父親還是兒子）同坐在工廠煙囪上的法西斯機槍手決鬥時所陷入的心情這個情節上。其實，我完全不是反對這個情節和這種描寫，我總覺得，在這個過程的描寫上有多餘的模糊不清的東西。但是，茲洛賓

責備卡里寧，說他把藝術創作表現為某種近乎神秘的、病態的現象，這就完全不應該了。完全不是這樣的。卡里寧只不過是失去了分寸感，把作家的作品表現為困難的、複雜的，要求集中一切精神力量、智慧、感情、記憶、想像的事情，認為真正的作家總是異常激動地用“心血”去寫作的。這無論如何要比簡單化地理解藝術創作，把它看成為一種純理性的、機械的手藝圖解式的過程要正確些。

茲洛賓對《嚴酷的戰場》的其它各種性質的非難是不值得爭論的，儘管這樣的非難很多，其中還有些是說作品的直觀性、對頓河農莊生活的陰暗描寫等等。所有這些非難，一般地都是沒有根據的。例如，關於“陰暗的描寫”這一非難，如果它只是根據茲洛賓對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所作的數學統計，甚至還是近似的、很不準確的統計提出來的，我們還有什麼好說呢？不管怎麼樣，在《嚴酷的戰場》里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被用來把小說推出現實主義範圍（像茲洛賓做的那樣），并把“模糊不清的形式”強加給小說的。小說里，各種不同的布局交織在一起——戰爭同現代生活，集體農莊的生活和工作同作家米哈伊洛夫的生活和工作，父親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的命運同兒子安德烈·索什尼可夫的命運——它們絲毫都不損壞生活真實和自然的敘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是限制而是要求藝術手法、風格的多样化，鼓勵創作的首創精神和探索。只有忘記了這些原則的人，才能“斥辱”《嚴酷的戰場》離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提醒一下，我們和茲洛賓的主要爭論是人道主義問題，我覺得，茲洛賓在其對卡里寧的《嚴酷的戰場》的批評里却是不信任和猜疑代替了警惕性，用冷酷無情和形式主義代替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他以為他在同素食主義的寬容進行鬥爭，在反對

为罪人恢复道德名誉，而实际上，在自己的文章里他却反对了关怀人和同情人的态度。茲洛宾以为他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則的这种理解和运用会对苏联社会有利，而我却認為他錯了。

三

在我們的文学界常常出現有关人道主义問題的各种爭論。今年一月号的《旗》杂志上，苏奇科夫对克尼波維支的批評論文集和潘諾娃的《感伤的罗曼史》(还牽涉到其它一些作品)的分析，正是从它們的人道主义傾向这一角度出发的。苏奇科夫的文章我認為是有趣的，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正确的。文章反对抽象的道德說教，“怜悯的人道主义”，超阶级的“人性論”等。类似的“人道主义”在我們的文学中(特別在戏剧方面)，电影中，繪画中的确还是有所表現的。有这样一些錯誤的自由主义概念，說什么可以而且应当有一般的“好人”和“正派人”，而不問其在当代斗争中站在哪一边，为誰的利益服务；这些錯誤的概念还没有在我們的文学艺术中根除。但是，对于苏奇科夫关于《感伤的罗曼史》的意見却是不能同意的。他断言在这部作品里，“感觉到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質有片面的理解”。

为什么是“片面”呢？誠然，潘諾娃不是那种具有公开的政論文体的作家，她往往是过份地向讀者隱蔽了自己对主人公的态度。但是，《感伤的罗曼史》的总的趋向并不引起任何怀疑。在对二十年代的各种人物、生活特点、事件的叙述中，洋溢着共青团員青春的詩情，洋溢着建立苏維埃报刊的詩情，洋溢着被革命所動員、召喚起来的人向恶势力、向旧世界的传统作斗争的詩情。难道这就是“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質作了片面的理

解”嗎？

斯科里諾在《必要的辯駁》中走得更遠了。她居然在《感傷的羅曼史》中發現了不僅是憐憫的、靜觀的人道主義，不僅是“冷淡消極的、幾乎漠不關心的態度，甚至还發現了善惡不分一視同仁的欣賞態度”，兼容并蓄、遷就調和地如實對待現實和人。而且不单如此，据批評家說，潘諾娃散發着她的人物中最卑劣的人物的“詩的煙霧”。斯科里諾未免太過份了吧？她对《感傷的羅曼史》这个“惡”、对潘諾娃这位女作家，表現得过于惡感了吧？誰會相信她的說法呢？誰會相信，潘諾娃会对下面两类人一視同仁呢：一类是——大卓雅的可惡的駝背兄弟，潜伏的白匪軍倉庫管理員，杀死庫什里亞的富农們，伊利亞·戈罗德尼茨基等；另一类是——小卓雅，庫什里亞，馬利婭·彼得利庆科，謝姆卡·戈罗德尼茨基等。在《感傷的羅曼史》中的确有“詩的煙霧”，但是，蒙在这种煙霧里的正是那些，比方說，像馬利婭·彼得利庆科这样的人，而絕不是她的敵人。

讓我們还是談談蘇奇科夫的文章吧。讓我們听听他的論辯，然后判斷一下吧。

他的做法主要是客觀地闡述《感傷的羅曼史》的主要人物謝伐斯季亞諾夫的形象。这里也發生着一種類似《審判文學人物》的做法，以便通過“審理”對作者作出判決。依蘇奇科夫看來，謝伐斯季亞諾夫是生活的靜觀者，其主要特點是內心的消沉。這個人是個無原則性的大好人，對人的缺點遷就寬容，不管這種缺點的社會根源如何。他整個地沉溺於對大卓雅的爱情中，這種爱情使他的意志和意識為之麻醉。一句話，在蘇奇科夫看來，這是作者所嚴厲鞭撻的那種消極抽象的人性的代表。

《感傷的羅曼史》的主要人物竟是这样一個不成體統的人，